

数据图像史学：研究路径、方法与理论构建

韩 雪 周 贇

摘 要：当下，大数据与电子计算技术的兴起，为传播学、历史学、艺术学及其他学科的研究在资料收集、储存、分析和运用方面，带来了研究主体思维、研究范式、叙事方式、历史价值呈现模型等方面的多重机遇与挑战。其中，对史学研究领域的“图像史”研究冲击尤其巨大。“图像史”的研究应该借力大数据发展带来的机遇，坚持唯物史观，加快图像数据库建设，搭建智能化网络平台，不断探索量化的研究范式，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以此来推动数据图像史学的科学化和学科化。

关键词：大数据，图像史，量化研究，研究范式

Data Image Historiography: Approaches, Methods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Han Xue Zhou Yun

Abstract: Currently, the rise of big data and electronic computing technologies has presented multiface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research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historical studies, art studies, and other disciplines. These impacts manifest in the collection, storage,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f materials, reshaping thinking patterns of research subject, paradigms, narrative modes, and models of historical value. Notably, the impact on “historiography” within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studies is particularly profound. Research in “historiography” should leverage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big data, adhere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image databases and intelligent network platforms. By continuously exploring quantitative research paradigms and introducing innovative methodologies, scholars can advance the scientific rigor and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data image historiography.

Keywords: big data, historiography, quantitative research, research paradigm

DOI: 10.13760/b.cnki.sam.202601009

图像信息的传播有赖于技术的发展。随着印刷技术、数字技术、书籍与新媒体传播影响力的扩张和“数字化”转型,图像的作用力不断放大,成为人们表达社会、传播文化的重要媒介。与此相伴,图像研究似乎成为显学,无论是在传播学领域的“图像转向”“读图时代”,还是在历史学领域的“新史学”研究范畴,都涌现出一批颇值得一提的学术成果,尤其是对后者来说,图像研究更成为一种史学跨学科的尝试与积极探索。在这之中,最突出的就是“数据图像史学”的勃兴,不同于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数据图像史学是“数字人文”下的一个分支,是立足于“图像”这一本位,强调利用数字化手段对图像符号进行分析与探讨的一条新兴的研究路径。聚焦于此,本文试图从数据与图像的关系入手,在厘清“数据图像史学”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对其特点、数据化建构、可视化呈现及研究范式进行探讨。

一、大数据是图像“现代性”的必然要求

图像是一种视觉传播媒介,也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性的必然诉求。“图像是人类最古老而又不断绵延焕新的文化基因,每一视觉图式都映现着人类的精神范式。”(韩丛耀,2017,p.5)如果大跨度地考察人类信息的传播技术,我们便会发现,人类的终极梦想是复制世界,而用于复制文字信息的“印刷术”是一种针对信息传播文本的复制技术,远不能满足人们复制世界的强烈愿望。于是人类在进一步完善视觉书写技术时,尤其对相似(类比)性图像符码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产制了许多描写和叙述现实物象的图像。“图像在能指和参照物之间应用了一种质的相似性,它模仿甚或重复了事物的某些视觉特征。”(2008,p.7)为了追求图像对现实物象时间与空间的记录性和视觉形象的指涉性效果,人类不断发展完善视觉传播技术,先后发明了摄影技术,以及以摄影为母体的电影、电视传播技术。

当下,人们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将口语传播技术、文字传播技术、图

(影)像传播技术融合在一起, DeepSeek、ChatGPT等AI技术的新的视觉媒介形式便应运而生,数字媒体行业的“新质生产力”逐渐形成,进而也推动了图像的数据化,即用大规模的模型和计算机演绎相结合,将图像符号转变为数字符号的意义,呈现出数据化的特点,进而可以在大数据的背景与框架下对图像史进行数据化研究。这种方法,是力图借助自然学科的方法及大数据的构建,来拓展与加深图像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的。毕竟,“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拉法格,1982,p.7)。

在数字人文视域下,图像与数据的结合,其实在很大意义上就是图像“现代性”特点的一个折射。在谈到图像与现代性这一问题时,华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1936年出版的一部经典的图像文化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认为:随着图像媒介的快速发展,受制于技术的工业性图像的复制,将会有着惊人的面貌改变。这一改变不单单影响着传播学领域,对于图像史学领域亦有着深刻的影响与变革。本雅明在其著作中详尽地论述了当时摄影对手工绘制图像的各种冲击。在数字图像时代的今天,数字图像技术对传统胶片图像的冲击不亚于当年摄影对绘画的冲击。实际上,当代一些学者的数字图像论述也恰恰在本雅明建立的主轴线上,只不过将“机械时代”替换成“电子时代”“电脑操控时代”“数字时代”“后摄影时代”“读图时代”等,或者是以“影像新纪元”“视觉文化”等来自我标称。上次的工业化革命和当下的数字化革命虽然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就文化意义来说又是一样的,那就是它们使用图像巧妙地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让人们不知不觉地浸淫在新的图像文化语境里。

于此,数字人文视域下的图像史研究应该如何面对?如何将巨量图像转换为可分析和处理的结构化数据?如何研究其中所蕴含的“历史脉络”?英国学者李斯特认为,目前的分析最先关注的是,“当人们在复制手绘(reproduce autographic)影像时,新影像科技与摄影的权力如何施展其中。其次,他们还重视,静态的相机以及动态的摄影机再现当代世界的独特方式”(威尔斯,2005,p.380)。也即,我们要重视数字技术视域下的图像的现代性。我们认为,“数据图像史学”的研究范式,不失为一个选择与探索的途径。

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于“数据”一词在认知方面各有不同,但殊途同归,他们都认为“数据”不同于一般的“数字集合”,是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参考意义的东西,体现出使用价值。如有学者认为,数据是指进行各种统计、

计算、科学研究或技术设计等所依据的数值，它是人类在测量、记录和计算中用于记录事物、辨识数量的工具与手段，是信息的载体（王冠中，2016，p. 85）。根据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大数据”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正快速发展为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从中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汪维真，姬明明，2017，p. 114）。

然而，当谈到“大数据”之时，人们则更加偏向于对“大”的关注，聚焦于数字的“量”和数字的“规模”（而非“规格”）。时至今日，世界上的众多学者、专家皆将目光聚焦到大数据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诸多变化上。但是，对大数据的定义与理解却各有不同。其一，在维基百科中，“大数据”的定义可归结为，数据量在规模上过于巨大，致使人们无法通过传统手段在相对时间内对其进行有效的处理，既而得出具有指导意义的数据；其二，从经济学的角度，有研究将大数据视作为一种可以提供决策力的信息资产；其三，相较于前两种认知，有研究强调大数据就是可为预测做出更好参考的海量数据。

上述三种对“大数据”因人而异的解释，可从一定层面反映出不同领域从业者的主观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其与图像史学的研究相结合而言，笔者认为主要有四点特征，可归纳为4V（Zikopoulos et al, 2013, pp. 5-9）：图像数据规模（volume）巨大、图像数据类型（variety）繁多、图像数据史学价值（value）密度低以及图像数据处理速度（velocity）快。

第一，图像数据规模巨大。现在较为常见的数据集合大都是以TB（太字节）为基，对于大数据而言，基准提升至PB（拍字节）、EB（艾字节）甚至是ZB（泽字节）^①，数据容量规模进一步巨大化。且随着当下各类史学数据库的建设，尤其是近代史上的图像档案建设，数据存量日益增加。

第二，图像数据类型繁多。大数据突破了以往关系型数据结构的限制，增加了图像、文本、音频和视频等非结构化数据，实现了字段长度的可变和可重复使用，对数字、符号乃至多媒体信息的处理更加容易。这样，面对图像及影视化了的图像数据，研究者可以快速对其进行分类和结构化处理。

第三，图像数据史学价值密度低。借助福利经济学中价值密度的概念可知，由于大数据在规模上过于巨大，按规模价值比算时，价值密度的陡然降

^① 1TB = 1024GB, 1PB = 1024TB, 1EB = 1024PB, 1ZB = 1024EB。

低。这在事实上也是成立的，笔者曾参与对中国近代新闻图像的处理，通过对两百多种晚清民国画刊中几十万幅图像的处理，发现其中重复和低史学价值密度的图像占有大量比例，这一问题目前尚未得到良好的处理。

第四，图像数据处理速度快。根据信息收集后所建立起的数据库，对特征信息进行数据上的集成、规约、清理和变换等数据挖掘，最终得到可视化的新信息，从技术上摆脱了传统数据处理时的诸多限制，因而在速度上可以达到质的飞跃。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数据相较，大数据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类型上，都是传统数据无法比拟的。

在数字人文时代，伴随着大数据与图像的碰撞，传统认知中的数据在规模上成为“小数据”，是构成“大数据”这一集合的子集或真子集。“小数据”的数据元素来源一般关注某一特定的方面，而“大数据”则广纳各类信源。“大数据”侧重于对观念的整合，而“小数据”则侧重于对关键信息的把握。除此之外，“小数据”偏向于微观方面的信息收纳，是在剔除与之不相关的、错误的数据元素的情况下所得出的集合结论，旨在明晰因果关系。而“大数据”则是包括了所有的不论错误或正确数据元素的数据集合，在宏观方面为信息决策提供了更多的参考依据，目的是与其他信息进行关联，以呈现相关关系。

二、图像史学的兴起、数据库与可视化设计

中国的印刷图像文化转向起始于1900年前后，以《点石斋画报》为代表，其发刊词写道：“近以法越构衅，中朝决意用兵，敌忾之忱，薄海同具。好事者绘为战捷之图，市井购观，恣为谈助。于以知风气使然，不仅新闻，即画报可从此类推矣。”（美查，1884，pp.4-5）此一时期的出版物上的图像，以其启蒙民智的追求，不同于文字的风格，在民间社会“恣为谈助”，广为传播，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从此，以图像为中心的传播形态在中国开始发展，“画报”这一载体得以迅速扩张，亦是“风气使然”。

进入民国后，图像在承担启蒙民智功能的基础上，以传播新闻、构建国家视觉记忆为主，相继产生了《二十世纪大舞台》《中华景象——全国摄影总集》《国剧画报》等，对传统文化及国情进行了图像知识性的搜集与整理。如《国剧画报》的发刊词写道：“本会旨在振兴国剧，发扬文化，补助教育”，“戏剧的力量是极雄伟的，有许多民族，他们精神的强弱，差不多全以他的国内戏剧性质为标准”。（梅兰芳，余舒岩，1932）20世纪30年代后，

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深,兴起了以国统区民办画报画刊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画报画刊为代表的抗战图像,亦正如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为《晋察冀画报》题写的发刊词:“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小小的画报里。”(罗光达,1990,p.1)这一时期的画报是为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服务的。大抵而论,以上几个时期,构成了近代中国图像传播史的一个演变脉络。

中国大陆图像史学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产生了蓝勇、韩丛耀、陈仲丹、陈平原等一批学者;台湾地区的学者对图像史的研究亦有一定的聚焦,其中以黄克武先生主编的《画中有话:近代中国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影响为大。它是台湾地区第一部对图像史进行论述的专著,全书分为“映现生活”“再现空间”“呈现中国”三部分,黄克武认为,对于图像史,“史家应探究的是:经由图像所产生的意义是如何生产与流传的?”(2003,p.iv)这也正是本文借助大数据技术视野的关注所在。

那么,如何处理“数据化的图像”?我们认为,图像史料的数据化与数据库建设是一条必然之路。中国历史绵远悠长,其中的图像更是蔚然大观,不同历史时期的视觉书写形态有不同的侧重点。如原始社会的重点是岩画、洞穴壁画、陶文装饰,先秦社会的重点是龟甲兽骨刻符,器物的铭文、铭图,秦代以后的重点是绘画、雕塑、建筑、书法、工艺、日常器物形制等,晚清、民国时期还要考察西画、摄影等西方传入的视觉传播技术工具等。看似存在相互关系的海量数据中不乏错误的甚至虚假的成分。我们认为大数据背景下图像史的数据库建设,就是要在科学定量研究和“视觉构成性分析”的前提下,结合定性研究和“场域论述分析”“历史原境形塑与重构”的理论方法,对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图像史料进行历史场域再现性构建和大数据的搭建以及现有各类史学数据库的整合与疏通。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政府主导、科研机构、院校与企业的合作来推进。由于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在此不做重点论述。又,日常生活中具有时间偏向或者空间偏向的媒介,出于不同的原因或目的,会以不同的方式吸引人们的注意。在由图像所构成的景观社会中,可视化的追求成为大数据同类聚合的最显著表现形式。因而,可视化数据以及数据的可视化是将大数据处理知识纳入图像史学研究领域所追求的目标。也即,我们认为知识的可视化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笔者以上述问题向百度旗下的“文心一言”提问(2025-08-05),其指出对图像史学的研究,要特别注意“二化”:一个是“数据化”,一个是“标准化”。“数据化”是“将图像转化为计算机可处理

的数据，包括图像识别（如通过深度学习提取图像中的服饰、建筑、器物等元素）、元数据标注（如时间、地点、创作者、材质等）、语义标注（如图像中人物的社会身份、动作的象征意义）。例如，利用 GIS 技术处理古旧地图，结合 RDF 编目方案实现空间数据的结构化存储”；“标准化”，即“建立图像史料的分类体系（如按载体分为竹木、丝绢、金属、纸、照片、影像等；按制作工艺分为刻剪、描绘、塑造、拍摄等），统一数据格式与标注规范，为跨领域研究提供基础”。以同样的问题向 DeepSeek 提问（2025-08-05），其所给出的回答中，则特别提及要进行“元数据标注”，即“提取图像的创作时间、作者、材质、主题等结构化信息，构建可检索的数据库”，并强调“通过图像中的人物、场景关联性构建历史社会网络”。

可以说，上述 AI 的回答都是具有一定实操性的，也有利于丰富我们对数据图像史学的认知，彰显了 AI 时代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可能与新路径。使数据可视化并具有一定的说理性，是在数据深度挖掘与分析后得出结论基础上的可视化操作过程。此外，尤为重要的是，要将数字图像的发展所驱动与形塑的社会与文化权力形式考虑进去，把握规律，凸显图像的文化特色，看清楚我们身处的全新的形势，既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又要警惕数字图像技术给史学图像利用与研究设置的陷阱。

当下的图像史学研究正处在数字科技的进步之中，数字图像在日常生活随处可见，而且数字图像仍处在日新月异的变动之中。因此，我们必须以变动的眼光和创新的思维来审视它，不断更新我们所具备的“图像知识”与“认知模式”。这是因为一方面人们理解和阐释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呈现出图像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图像信息日益成为人类主要的信息来源，而大数据的兴起又导致信息、知识日益复杂化，将其可视化，则是大数据研究及图像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众所周知，人类记录历史、表征世界和传播文明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语文（言语、语言、文字、象征性符号等）为主要载体的线性、历时、逻辑的记述和传播方式；另一种是以图像（图形、图绘、影像、结构性符码等）为主要载体的面性、共时、感性的描绘和传播方式。语文记述的方式近五千年以来已经逐渐成为人类主要的记录、表征和传播文明的手段，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高度尊重。而随着大数据的兴起及其技术的发展，图像数字化逐渐普及，引起了人们对数字图像的极大兴趣，也即在现实生活和当下的学术生态领域，对“可视化数据”的需求越来越大（贾登红，2016）。毕竟，可视化数据丢开了通篇累牍的文字表述方式，利用图形、表

格等形式使具有内在关联的数据结构化、清晰化,使信息源深层的内容一目了然。

三、数据图像史学的定量、质化及反思

大数据带给图像史研究的挑战和机遇是全方位的,既有史料收集、整理、运用和存储方面的问题,也有数据处理、信息化技术的掌握等问题。在这之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历史研究者要更新自己的思维方式,从“数据”与“技术”的视角理解和展开史学研究。要寻求理论、思维到研究方法的整体性变革,创立适应大数据发展趋势、符合当代中国图像史学研究的实际可操作的量化范式。有学者认为:量化研究范式就是指“能够涵盖一定地域范围、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整体性大规模个人或微观层面信息的系统(一手)资料,并将这些资料按照一定数据格式进行电子化,构建成适用于统计分析软件的量化数据库并进行定量研究”(梁晨,董浩,李中清,2015)的一种研究框架。

大数据的发展不仅增加了图像史料的数量与类型,还推动了图像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一些原先应用于地理学、统计学等学科的工具开始逐渐被历史学者接受并加以应用。”并不是任何“数字技术”都适用于史学研究,“历史研究和历史资料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复杂性”,而量化数据库的建设与使用则能从规模、连续性等入手,促进史料的相互连接,增强史料的互证功能,从而有利于开展长时段、合作化和群体性的历史研究。(梁晨,2017)同时,“计量史学虽然不是大数据时代的产物,但随着大数据的兴起,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汪维真,姬明明,2017, p. 118)。对于此,我们是深以为意的。

数据化的软件则是计量史学须臾不可离开的“分析工具”。SPSS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和 SAS (Statistical Analysis System, 统计分析系统)、BMDP (Biomedical Programs, 生物医学程序) 并称为国际上最有影响的三大统计软件。现在 AI 技术的横空出世,更是让大数据技术如虎添翼,大大节约时间成本,提高效率,且提升研究质量。如在利用 SPSS 软件分析时,应该努力推动其拥抱 AI 技术,在研究时更新研究范式、认知模式与价值关怀,并由此催生新型的图像史学研究方法与数字史学协作的工具。譬如,对数据图像史学研究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图像分析难以依赖概念定义和逻辑推理等单纯思辨方法,要能够比较准确地揭示图像及其背后历史的发

展脉络,把握其内在规律,就必须在一定样本数量的基础上,将研究对象的各项特征加以量化,并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各变量在性质、结构方面发生的变化,以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数量关系,明确主要因素,这样才能为某一时期的图像体系及其运行提供部分解释。而在 AI 时代,可以借助图像“AI 训练”,实现 AI 的自主化学习,进而使 AI 能够“自主”地对图像进行标识,从而提升研究的效率,实现真正意义的大数据分析。毕竟,我们认为,真正的数据图像史学的研究,必须要能够将图像数据化,能够让图像被计算机或软件系统计算、统计、分析,唯有这样,才能通过数据来编码图像,进而分析和理解历史。当然,尽管数据图像史学的研究是依靠现代电子计算技术发展起来的,但我们绝不能将其仅仅视为一种技术,而应当将其当作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研究范式(Best, 1991, pp. 163 - 171)。

然而,不论多么完善的历史研究都无法完美地再现当时的客观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历史研究同社会学研究一样,主要采用共相模型(nomothetic model)来解释世界,它不用枚举所有的影响因素,而只选用解释总体时最重要的因素,即用尽可能少的原因变量提供尽可能多的解释。因此,统计分析也可以被用于历史研究,它很好地应对了历史图像的特殊性,提供了合理有效的工具。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研究中使用了社会统计分析方法,但是科学研究是有整体性的,一个好的研究不可能仅仅依赖于统计分析方法,统计分析只是整个研究中的一环。

当然,数据图像史学研究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它只是一种相对的、具有辅助性的研究手段而已。“我认为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研究者担忧的是,他们一旦承认自己用了这种方法,可能会受到‘烹煮数据’的指控,可事实上他们只是想对计量性‘文本’的内在结构有足够了解,让自己能对其有效‘阅读’,探究其深度。我认为计量研究者有必要更多地思考,他们对自己数据所作的基本阐释性质询有怎样的认识学意义。”(休厄尔, 2012, p. 364)小威廉·H. 休厄尔这段话,对我们有很好的警示作用。

四、结语

大数据体系架构的搭建过程是人与信息活动空间进一步开拓的过程,在大数据所形成的数字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对存在于周围世界的事物进行触碰和重塑,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更是如此。著名史学家傅斯年曾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

□ 符号与传媒 (32)

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2009，pp. 43 - 44）在数据科学与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科学的不断互动所带来的影响下，专业门槛和技术壁垒已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学习与融合的障碍。我们已经处在大数据时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应该抓住大数据带来的千载难逢的好机遇，乘势而上，完成一次数字人文时代研究路径的华丽转身。当然，在研究中，数据图像史学必须坚持历史学的本位，大数据只是历史学家手中的工具，毕竟，人永远是第一位的，大数据“不能改变学术研究的本质，它仍然仅仅提供研究的资料基础，史学成就的取得还是依赖史学界诸多学者的思考、探索和相互讨论”（汪维真，姬明明，2017，p. 118）。因此，对于数据图像史学的研究，学界应立足于传播学、考古学、艺术学、历史学及计算机学科，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扎根图像史料，借助大数据的便利条件，充分诠释分析，才能真正推动数据图像史学研究的进步与发展。

引用文献：

- 傅斯年（2009）.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载于欧阳哲（主编）. 大家国学·傅斯年卷，40 - 49.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韩丛耀（2008）. 图像：一种后符号学的再发现.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韩丛耀（2017）. 中华图像文化史·图像论卷. 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
- 黄克武（2003）. 导论. 载于黄克武（主编）. 画中有话：近代中国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i-xii.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贾登红（2016）. 从历史中的图像到图像中的历史——评大型文化通史丛书《中华图像文化史》. 新闻界，20，17 - 20.
- 拉法格，保尔（1982）. 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 梁晨（2017）. 量化数据库：“数字人文”推动历史研究之关键. 江海学刊，2，162 - 164 + 239.
- 梁晨，董浩，李中清（2015）. 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2，113 - 128 + 191 - 192.
- 罗光达（编）.（1990）. 晋察冀画报（影印集）. 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
- 梅兰芳，余舒岩（1932）. 发刊词. 国剧画报，1.
- 米查（1884）. 发刊词. 点石斋画报，1，4 - 5.
- 汪维真，姬明明（2017）. 大数据时代的史学因应——“新史学青年论坛：大数据时代的史料与史学”会议综述. 史学月刊，3，114 - 120.
- 王冠中（2016）. 大数据对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挑战. 当代中国史研究，3，84 - 94 + 127 - 128.
- 威尔斯，利兹（2005）. 摄影学批判导读（郑玉菁，译）. 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

公司.

休厄尔, 小威廉·H. (2012). 历史的逻辑: 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 (朱联璧, 费滢, 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社.

Zikopoulos, P. C. et al. (2013). *Understanding Big Data*. New York: McGraw Hill.

Best, H. (1991). Technology or Methodology? Quantitative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in Germany.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25 (2), 163 - 171.

作者简介:

韩雪, 博士, 讲师,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研究方向为图像史学, 历史图像学。

周贇 (通讯作者), 博士,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文化学、图像文化史。

Author:

Han Xue, Ph. D., lecturer of Nanji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Industry Technolog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historical image studies and historical iconology.

Email: 119648068@qq.com

Zhou Yun (corresponding author), Ph. 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culturology and history of visual culture.

Email: shtu-yun@163.com